

两行逻辑论初稿

祁洞之·著

我热爱哲学的历史，因为她给一切关于哲学的思想活动提供了基准坐标，我们自己哲学思想的质
量与把握这个坐标系的清醒程度息息相关。哲学史的陈述虽然只凭借思想的选择和判断之功，但能达
到确定所从事研究的逻辑起点之效。理清自己所做工作与哲学历史衔接的逻辑基点，正是自我确认研
究意义的有效手段。因此，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思考，必须基于哲学史并在哲学史中突出所要研
究的问题。

佐思录〔卷三〕

两行逻辑论初稿

祁洞之·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行逻辑论初稿/祁洞之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12

(佐思录; 3)

ISBN 978-7-5610-6236-4

I. ①两… II. ①祁… III. ①逻辑—研究 IV.
①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0054 号

本书由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导言：

哲学为什么而存在？

哲学为什么而存在这个“大而无当”的问题近些年来一直揪着人们的心。从哲学家到哲学的职业票友，再到一般意义上关注着哲学前途的普通哲思者，都为这个问题而困惑。哲学家很严肃地追问这个问题来源有自，尤其是为西方哲学命运担忧的哲学家。这是因为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家园——西方哲学的体系——经历了一系列的结构颠簸：首先是形而上学封闭性的打破，究竟要不要请进“神”来拯救哲学，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然而又是一个惆怅此中来的本质问题，“上帝死了哲学怎么办”的主题异常持久地动摇着哲学的独立性本身；其次是另一个向路的自我逼问，哲学开始更苛刻地要求自己要有作为一门严密思维科学起码的职业操守，从而拒绝左右逢源、大而无当、理路模糊的思想体系占据哲学的主要殿堂。这样哲学的使命便演变为“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寻求最坚实的地基和最终极的根据”，哲学也以此坚实的根基为基础逻辑地展开自身。但这又带来了新问题，逻辑研究的自演自化无限地加重自己的使命感，将自己构筑成一个在统摄范围上自命为与哲学的疆域相等价的思想帝国，并扬言逻辑终会将哲学逐出其领地，因此断言哲学终将在任何意义上失去自身的存在意义。于是西方哲学精神家园的结构颠簸导致了畸形的自我拯救形态：哲学无心恋战于任何体系的建构，而是旨在发现哲学体系的破缺，将“解构”及其“超越”的诉求庄严地委任于自己，将任何“体系化”的哲学视为时代性飘逝的昔日暮霭，唯有“意义的不断发现和超越的过程”才能成就哲学自身的庄严。这就变相

宣示：哲学作为“超越者”和“创生意义”职责的履行者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而哲学的正务是要实现“人”的“自由的意义绽放”。

平心而论，西方哲学遭受的精神家园的结构性颠簸，不亚于时下发生的这场金融颠簸。作为精神自救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种种“消解”和“解构”的理论过激，这就如同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怅然长嗟。严肃的哲学家真的要“消解一切价值和意义而后休”吗？当然不是，西方哲学的发展有“仰赖必要的张力”的历史传统，“解构”作为一种时代性的张力，正是呼唤“建构”的解毒良药，它要让畸路上的“建构”历史性地休克，等待和呼唤高屋建瓴的体系的来临。回想牛顿的物理学的“解构”遭遇，再回想爱因斯坦对解构了的物理学实现的体系重整，当可想象，“必要的张力”是如何地发挥了其当有的作用。对于哲学的时代性解构主义，历史也终将给予同情的、宽容的但究其实质却是否定性的评价基调。原因无它，哲学固然是时代性的思想精神，但哲学不是“膝跳”式的现时代问题的条件反射应对。从恒长的哲学历史发展来看，结构性的理论颠簸几乎是随时发生的，解构主义抑或是批判主义的理论也必然地应时而生，并且它们也不失之精辟与深刻，但它们都是作为一种对未来的呼唤而展现自身的意义存在的。解构的思潮过去之后，被呼唤出来的未来的“建构”一定会更坚实，更禁得起解构主义的诘难。更高一级的“建构”将平和地展示：历史上的解构主义其实是围绕着伪问题的纠缠不休——尽管在面对旧的理论的“思”方面，它具备完全的理论正当性。知斯道也，可以始论夫“后现代”，也可以创造性地进行理性的“意义绽放”。但如果无意于未来的“建构”，则只能划入哲学的“票友”另类了。“票友”是个雅称，哲学的水至深，临渊羡鱼实非为过。所过者当为“职业票友”：以哲学为业，以忽悠为务。他们言及哲学及未来，可能太过于“量入为出”。对职业票友来说，哲学作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我不得不承认“职业票友”这个称谓过于尖刻，但它比较写实。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范”的提法，是民国初年中国学术状况的一种写实。如果特用来称谓“五四”前后的现代性展开的特征，那我们着实是对民国学者大不恭敬。事实上中国的学术视野国际化初开，“西学东渐”是规律性的必然，“中学西范”在当时也并非大过。所不能理解的是，初期的现代性启蒙百年之后，当代的学术主流更露骨地狂舞着“中学西范”的蹩脚戏，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果将之与民国学者作对比，我们只能说民国学者还是秉持着脆弱然而尚存其风骨的文化独立性和学术自主性的，同时从西方借鉴来的“范式”尚具有西方宏大历史的纵深感和基本思想疆域的穿透感。而今天的“中学西范”则显得更加楚楚可怜：言必称大师，推必谓巨擘；每接受必视之为珍典，凡传播必摇之以心旌；垂之如受宠，效之若东施。把当“哲学家”的“家”奉若神明并自诩对中国学术界的某某研究有开创之功。而更加无奈的还是对所摹习的“范式”无端的推崇。或可这样说，同样是对外来范式的摹习，如果碰巧历史性地赶上一个好的范式，则摹习也有近贤希圣之感；但如果赶上一个不那么好甚至是坏的范式，那么没有反思的摹习便只能是坏的摹习。民国学者郑昕先生曾有言：越过康德会发展出好的哲学，而略过康德只能发展出坏的哲学。此言犹在耳际：如果公允地把西方哲学家们的后现代情思看作是对康德式标志着精神家园建构的哲学的超越，籍后现代之路的开辟寻求新的精神家园的话，那么对大多数盲目的思想家摹习者来说，他们因为从来不曾进入过这片精神家园而享有精神贵族的落日余晖，那么“去日苦多”的摹习式精神嗟叹也只能是略过曾经辉煌的精神家园蒙然而发的无病呻吟了。因为摹习的盲目，故可命名为票友；但票友又吃的是哲学的职业饭，故而只能命名为职业票友。职业票友之风日盛，使得哲学作为什么而存在的命题在一片消解的揶揄唱和中沦陷。至于“苟以分异人为高”“偶然无所归宿”“以不俗为俗”等荀子早已刻画的丑态（见于非十二子之论），也足可供哲学界镜鉴。

以西学为宗的时代思潮紧随“哲学自身已然消解”之论翩翩

起舞，也悄悄地使“中国哲学”的立论溶解在“国学”或“儒学”的外延锁定之下。既然西方哲学都难以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正当性辩护，那么，本来在西方哲学面前就自愧不如的中国哲学，就更加羞齿于中国人的思想积淀搭配进入哲学的殿堂了。所幸，“国学”“儒学”这样的称谓还足够高贵，能供人们回味自己的历史曾有过的精神贵族的落日余晖。“第某代新儒家”的自我封谥也热闹非常，我曾看过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第某代新儒家为醒目标题的奉和之作。

尖刻的话说多了，也难免“不俗之俗”。毕竟，对学术界的反常同样以“膝跳”的方式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也不足为勇。既不是西方意义上哲学家也并非职业票友，我们倒是应该回归到一个具有平常之心的哲学思索者的轨道上来。蓦然回首，哲学毕竟还是应该就在灯火阑珊之处。那么哲学到底是作为什么而存在呢？对它的无思必招致哲学的无可思。

我曾经惊讶于绵长的人类文明竟然如此禁不起度量计算之后呈现的短暂。尝与学生及好友作过如下的盘算：设想一个人 60 岁即告终结的人生，这样的甲子人生便充当了一个直观的度量。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越过 40 余个这样的人生，我们差不多能与孔子谋面；越过 60 个这样的人生，我们将比周公更早来到人世，或已和殷商一代的某公炮制甲骨；而越过 80 个这样的人生，我们就处于三皇五帝时代，或许和长眠于牛河梁的大巫们坐论“绝地天通”等等……人类在这个冰河间歇季中所形成的有史可考的精神文明，竟然仅仅是这样 80 余个甲子人生薪火相传聚敛而成。再思当下文明的璀璨，对人类本身的敬仰无不由然。这是怎样高效率的精神文明生产工厂啊！于是，我想到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一下，这最长不足 80 个甲子人生的人类文明历史，之所以生出璀璨如当下的人类文明的所依所由，或许能够为我们对哲学本身的关切，寻出一条更近人性的理路来。

与这 80 个甲子人生的样本空间形成“对照组”的，我选择在变化的生态环境下以自然生存为目标的生物种系的“基因进

化”进程组，不妨称作“生存基因组”，相应的，80个甲子人生所组成的，胡乱唤作“文化基因组”。生物基因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生存基因组”的稳定演化尺度，大概是以几十万年为单位的。

这两个对照组有什么共性呢？首先，人类是从这个“生存基因组”当中剥离出来的，之所以剥离出来原因无它，恰恰在于它的文明生产能力太高效了；其次，文明生产的归宿，还得回到生存这个根本主题上去，如果人类的精神文明仅只是世界末日前的狂欢派对，那么她或璀璨或妖艳都将灰飞烟灭，那可真正实现了人类生存意义的消解。最后，这两个对照组的最本质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最普适意义上的“命运体”的自身命运展开实现过程，后者是作为生命种系的自然命运展开形式，而我们关注的前者，则是作为孕育于这个自然命运体系并与之耦合共处然而又与“类文化生活”的未来设计紧密相关的人文命运体的展开与实现过程。这样，“类文化生存”与“类自然生存”的相互比照之间，就会形成别样的“本质看”统觉。

在这种比照之中，我们需要庄重地考虑如下的几个与哲学的本质真正相关的问题：1. 作为人类的理性或知性根本未参与其中的纯粹属于自然界的“生存智慧”，即能够使“共命运体”的类生存方式得以稳定延续的智慧形式，为什么无有例外地选择了基因形态的命运保障程式？基因究竟以怎样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把“类生存”的诸多复杂形式统摄在一起，以至于“基因在则命运展开的保障在”、“基因不在则命运展开的保障不复在”？此中的所以然之故必然要凸出地呈现在哲学研究的视野当中；2. 如果说人类作为最为“成功”的自然命运基因选择的幸运儿，作为“万灵之长”逃出了自然食物循环链的“生态如来佛法掌”而成为目的化生存的特殊的“类”，它的“类自然生存”和“类文化生存”的命运保障程式有公共可比性吗？如果有，那么人类文化生存基因形态又是什么呢？3. 能否将普适意义上的“一般命运体”的命运展开保障机制和程序与“基因”广义地挂钩在一

起，从而使人类自觉的文化建构以来的、与人类自然与文化生存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基因”概念突出出来，与自然的物种基因的使命、功能、获得、突变及其展开程序一并纳入“命运体系衍化论”的文化人类学构架，并用这个构架透视人类整个思想衍进的历程及其思想家的本质意义？

第一个问题的哲学实质，是基因与命运体之间“充分必要性”的互存关系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马克和达尔文在自然选择性的遗传理论背景下，几近于证明出基因之于物种的重要。但在实验室意义上发现物质性基因载体之前的很长时期，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更加强调反方向的结果，即“性状”不是基于一套高级程序的形式演绎的，或有别的物理依据有待察知，或是神创的目的实现形式。总之，与生命体各个部分均内置了高级程序的理论模型无涉。这使得我们关于“本质”的理解范式在基因的存在性面前羞愧难言：我们在究问生命或有机体的所以然之故的理论展开中，鲜有与“基因”的学说靠谱的。

与此同时，基因科学的理论进展正以图谱化和进化路线图化的稳健推进，用事实的铁证由浅入深地凸显着基因的本质特征。能够确信无疑的有如下几个方面：1. 生命以拥有基因的方式而存在，是无有例外的；2. 基因的多样性和基本稳定性是同物种的多样性及基本稳定性一一对应的；3. 性状的生物学外在特质与基因图谱序列的内在特质有着超稳定的联系；4. 基因是在自然选择的物种进化的命运展开过程中不断被修正改写的；5. 基因对生命体的控制程式远远不是“命令—执行”式的简单操作，更多的是类似于“操作程序—数据引导”的互动模式。总之，我们目睹着这样的革命性的理论进展：未来期待中的生命种系基因图谱之于生物学，将像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图谱之于无机化学一样具有更深刻的系统解释力度，而不再允许与该系统解释逻辑南辕北辙的穿凿附会。其中，哲学最应该使自己的理论建构于其上的奠基性结论是：作为生命的本征形态，生命体与基因，是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共轭”对偶。

第二个问题的哲学实质，是能否将狭义的“生物体”概念置换成广泛意义上的“命运体”概念而适用于基因理论的问题。广义的“命运体”是否普适性地具有“生物体”具有的基因本征，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命运体”范畴对“生命体”范畴的扩大，而是在于“生命—基因”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共轭”对偶关系的“生命体”本征，其发生学的逻辑基础是否存在于“命运体”的命运规定性当中。

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都是在命运的展开过程中生成的。不妨这样为生命作一个最基本的规定：生命体是处在自身的命运展开状态之中的，当且仅当它与其栖身的环境发生实质且安全的双向接与对待关系。这里的实质性是指：它在环境中的获取维持着命运展开的过程稳定以及决定着展开方向，与此同时它对环境也具有本质性的所与，换言之环境及其环境中的其他命运体也是在这种接与对待关系中维持着命运展开状态的；安全性是指：不管是直接的接与物或间接的环境系统，只要是导致命运展开程序的终结（用计算机术语是导致死机），便是对此命运体非安全的，相反，只要能使命运展开程序“运行着”，便被视为对之安全的。

以此出发点考察生命的本质，首要一条结论是，生命体是被“有限性”严格限制着的存在：在时间向度上，生命的命运展开总是处于对“未来”的开放状态，但“未来”是不能进行任何确定性预设的，换言之，“未来”严格地处于呈现于“当下”的现在之外；在空间向度上，“局部”的限定性同样也不能使其自由地跨出“当下”的囿限；即便是形式功能的程序性传递过程中，执行着一个程序就意味着对其他程序的放弃，也是处于“程序结点”的“当下”性限定之中。这样，我们发现一个重大的事实：处于“当下”的命运体是时时刻刻与超越了“当下”的“非当下”环境世界打交道的，而一旦打交道失败导致命运程序“死机”，则标志着命运体自身的完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任何个体都不能同时栖身于“当下”和“非当下”，而“当下”运

行着的命运展开程序又总是在对“非当下”世界适时进行接与对待的互动。我们暂且将这个“当下”与“非当下”的互动关系简化为“操作程序”与开放域的“数据”，生命的过程性保障基础是“操作程序”能够正常、有效地“读取”和“处理”非当下的数据。那么问题便集中于：这种保证性的基础何在呢？

这个互动过程只要成立，换言之生命只要不归于死灭，那就必须具有如下的三个要素：1. “非当下”虽然是不能确定的，但必须有一种要素使得“非当下”对“当下”命运展开的意义是确定的。换言之，必须有一个程序机制，使得不确定的“非当下”以意义确定的方式“当下化”；2. “当下”虽然是显明于自身的，但“当下”的生命意义一定是在与“非当下”的接与对待之中呈现和绽放的。换言之，也须有一个程序机制，使得“当下”以确定的意义存在方式呈现于“非当下”。3. 前述必须拥有的那个程序机制，一方面在“当下”与“非当下”的接与对待之际必须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内置于“当下”的生命体而不是别的方式——譬如“上帝”的“在场”方式。综合这三个要素，只有“基因”的形态方可担此命运保障之责。

这就足以说明，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是在于她被“命运体”的基本形式所限定；“命运体”之所以必须携带“基因”，是因为无此载体就不可能沟通“当下”“非当下”的接与对待之际。所有命运体都必须拥有超越了“当下”“非当下”止限的超级程序形态——尽管这种超级可以从微弱到强大，并且具有无穷的多样性。

第三个问题的哲学实质，是建立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尺度的问题。这里蕴含着的两个大问题是文化命运的规定及其人类历史本质的解读方式。前一个问题是个较少引起学界分歧的问题，文化之发展、存续、创生和毁灭，也几乎是历史的常态，本不难理解。但在什么意义上强调文化命运体的本征形态，仍会众说纷纭，却不会断然否定文化命运的有机生命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故而，这是一个好理解和好解决的问题；至于人类历史的解

读方式，则几近莫衷一是了，我们几乎无法典数思想家的学说，甚至流派的概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致上说，神创派、圣创派、智创派、强权派、经济派、技术派、制度派、斗争派、和谐派、进化派、自衍派等等，都有各自的拥护者及理论基础。

我们无意与任何一个学说论辩，但我们坚持文化命运体在自身的存亡攸关问题上，应该反映出历史的本质特征。其实，公允地说，正像自然科学在没有理论接纳准备的情形下面对基因发现的事实一样，哲学与社会科学也并没有自觉地建立一种理论上的准备，以严肃认真的将“人类文化基因”纳入理性的视域。究其源，文化的多元独立原发性常常导致“文化中心论”的自闭症，在文化融汇的全球化景致没有铺陈开来之前，单一形态的文化共同体很难用“文化种系”的分有者的角色观反省自身。正如同当我们作了“人非草木”、“人非禽兽”的自我厘定之后，很容易忘掉我们的自然种属一样。但如今不再是这种情形了，全球化将人类总合了的“类文化生存方式”直接搁放在自然界的有限性和脆弱性面前。我们应该谦卑地说，这种“文化命运体”的角色视野不是我们智慧张扬的结果，而是完全被动的迎面式“本质直观”的惊觉。由此看，我们以“命运体”还原人类历史本身，并用“命运未来”的本质关切回溯人类文化的命运展开历史，当属未晚的良知觉醒。同样，用基因论的人类文化命运演化史观来检讨人类文明史，也并不是我们的理论发明，而是向生命界的自然智慧借鉴、学习的结果。“基因”与“命运体”互为充分必要条件的认识觉醒，是我们修正非基因论的诸种史观的理论支撑。

至此，我们方具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以回答“哲学作为什么而存在”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基本基因形态的或基因不健全的命运体一定要夭亡这个事实之后，我们便知道不朽的或具有久远生命力的文化共同体是一定包含着自觉的文化基因采集、编写、刻录过程的。

用这样的视角看，人类在短短的 80 个甲子人生的薪火相传过程中成就如此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寻找人类文化基

因的文化人类学地位，无疑是对人类文明本身的虚无。因此我们按图索骥，在文化人类学的视域中，不难直观地“本质看”出下面的事实：历史上的哲学是作为人类文化基因图谱的方式实现其人类学的意义存在的。相应的，我们可以凭借人类学的视野，以敬畏之情为哲学家给出如下定义：哲学家是这样一种神圣使命的实践者，他们以睿智把未来人类必须接与对待的世界以意义的方式铺陈于当下，并为人类采集、编写、刻录文化基因。

这个过程就是哲学的本然使命。同时使我们明白，真正的哲学必须将智慧的心血凝结于“当下”与“非当下”的接待交之际。只有对这个“际分”穿透关系的不懈探索，才能在理论上达到文化命运体从“必然世界”走出、进入“自由世界”的命运保障目的。如前所述，它必然集中于三个基本的要素来展开：第一是“非当下”的意义“当下化”。这意味着哲学所探讨的世界，是对于人的意义世界：它既是向时间、空间和交互功能的无限性开放的世界，又是落实到人类的命运展开过程的意义有限性收敛的世界。第二是人的本质意义在“非当下”世界的陈放。这意味着哲学家所讨论的人，绝不是肉身的存在和自我当下性的沉迷，而是命运实现的过程中以“接与对待”的方式向“非当下”的意义陈放形式，及其将投射出的意义以“非当下”为镜鉴返向自身的意义回射。第三，哲学必须是现实超越与终极关怀的集结体。它要牢牢把握“当下一非当下之际”接与对待程序的可能形式和综合后果。没有现实超越无以言对“当下一非当下之际”的穿透；没有终极关怀无以言将文化命运体的命运当为己任。

对“类自然生存”和“类文化生存”的基因论命运体的比较分析可知，对“当下”的现实超越不仅仅是哲学的理想情怀，也是命运体之所以保证自己是命运体的无外必然。超越当下方能够对当下所在之域“本质直观”地看，这是哲学赋予自己的基本规定性之一。现实超越的目的，是对“当下一非当下之际”的把握方式和命运后果有一种本质的洞悉。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明白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同时又是“版本多样化”的——就像物种基

因的多样化一样；还不能指望有“终极版本”的存在，因为基因结构的“版本升级”是命运体进化的唯一保证。

这样，我们也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不同的目的志趣和理论分野。

西方哲学倾向于将“命运体”用一个抽象的“主体”方式特立出来，使他具有一种为“非当下”世界理性立法的能力。这种哲学尝试的不言之义有二：其一是暗含着这样的设问，不对“非当下”世界进行彻底直白的洞悉，如何放心而自由地对待“当下一非当下之际”？其二是为理性设立了这样一个标准，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彻底统摄“非当下世界”的理性“终极版本”，只要这个“终极版本”握在“主体”的手里，“非当下世界”就会坦白的为人类所主宰。由此可以理解西方哲学的不懈实践：构筑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确立理性真性传递的“逻辑”原则、为科学设立灯塔和充当“探路器”、为科学奠定终极的理论基础。等等这些表明，西方哲学的实践无不是在寻求对“非当下世界”的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的方案。

中国哲学的志趣不在于要“非当下世界”的彻底坦白。他们明确一个命运体是以命运体的方式向着丰富的无限性展开着的，他们把“非当下”处置成更大的“命运体”，“当下一非当下”的共生结构被看成是定理。而“当下一非当下”之“际分处”或径称“天人相与之际”的“不测之神”，才是中国哲学展开哲思的公共着力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对“易理”的理解千差万别，但一个不容否认的思想共识是，易卦中的两个核心的爻（二爻和五爻）代表着命运展开着的命运体，而其他的四个爻则代表着“非当下世界”向命运体呈现着的意义结构。这样，命运体在“当下一非当下之际”的接与对待关系，是从“卦”的谱系铺陈的复杂性当中反映出来的。这条思想伏线很容易被当代的哲学家遗忘，也就把“生生之谓易”根本前提铲除干净了。这个问题的仔细陈述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感兴趣者可参阅笔者1994年出版的旧作《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不纠缠

于这个问题，就从此文借“基因”的主题实施的论证过程来看，虽然我没有太多地使用中国哲学术语，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其立论依据离《荀子》的“解蔽篇”和“天论篇”是不远的。在我看来，本文的立意是在根本精神的方面回归了中国哲学的使命及其主题。以人类命运体为关怀中心，中国哲学的精神可否用这样三句话作一个概括：赞天地之化育；立人文之璀璨；享人生之天年。这应该是文化人类学上的中国哲学脚注吧！

再回到文章开篇，说说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一种解释和一点意见。从哲学对自然的形式与质料的剥离性析理方式的获取，西方哲学渐渐取得对自然界的“自由立法”意志；“理性”要完成一组旨在让自然界跟随人类逻辑世界的展开程序而展开的“基因指令”，并部分成功地指导人类在自然面前“科学化生存”；哲学又将自己的使命指向为科学寻找终极可靠的基础，而这正是西方哲学目前经历着的一组基因工程，但显然这个基因组的“吉祥谋划”工程出现了纲领式的失败，它是一座无法按既定纲领封顶的“烂尾楼”。究其根本原因，是类似于物理学的“牛顿纲领”、逻辑学的“希尔伯特纲领”，以及任何意义上封闭的哲学“形而上学纲领”，都被釜底抽薪地宣判为逻辑非法。由“哥德尔纲领”引导实施的、被计算机程序运行逻辑一再证实的必然接受的结论是：任何一劳永逸的全能逻辑结构均属妄想。我们只有通过逻辑系统的版本升级扩充程序的演绎任务，而任何版本均非终极版本。这是西方哲学基本纲领导致“烂尾楼”的最本质原因，而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西方哲学必须发生彻底的转向。而对“烂尾”的反思呈现一片“后现代”的指手画脚，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是，它们处于“纲领饥荒”的间歇态，而不是纲领范式成熟的常态。然而对人们——尤其是对还没有补完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中国哲学界来说——有诱惑力的一个说法是：这个工程不是烂尾，而是由自然科学实现了它的终极完成，从而导致哲学在该问题上再也无事可做了。下面留给哲学的问题不再是关于自然了，而是人的自我意义化生存本身。如此，“天地人神”各处

其位的轻歌曼舞式的“人的意义的绽放”，似拱在中国当下哲学上空“穹庐”而“笼罩四野”。

其实，从人类文化基因采集、编写、刻录的“正常”的哲学观来看，人的意义只有在作为类的文化命运展开的思想场景中，才能纳入哲学的视野。孔子说“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样意义的人。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是已然完成了的完满终结。哲学烂尾楼之所以会烂，恰恰在于没有将人与自然纳入各自的命运体考察轨道，更没有将共命运体的机制连接“深觉明察”，它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端。如果无法把人类的“类存在”命运展开的方式与自然的“命运存在”的关系处理好——这恰恰是生命哲学及生态哲学的软肋，那么我们凭什么“意义化地绽放自身”？